

# 自发秩序创新与金融监管的正义性分析 ——从哈耶克与罗尔斯的视角出发

冯 毅<sup>1</sup>, 唐 航<sup>1</sup>, 陈雪君<sup>2</sup>

(1. 中央财经大学 商学院, 北京 100081; 2.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以余额宝为代表的创新性金融产品带动了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发展,但同时金融监管部门对这种创新业态的压制态度也引发了外界对中国金融下一步改革的思考。目前政府主导的人造金融秩序成为下一步金融改革的主要障碍。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证明了哈耶克自发秩序理论的适用性,这也是中国金融领域深化改革的政策取向。同时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表明具有正义性的监管制度是金融领域自发秩序基础条件形成的制度保障,在这个条件下金融领域的自发秩序创新才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关键词:** 自发秩序; 创新; 金融监管; 正义

**中图分类号:** F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98(2015)02-0020-06

## 一、引言

大数据信息的出现使得金融业的创新步伐不断加快,基于大数据背景下的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带来了金融体系的革命性变革,余额宝和财付通等新型理财产品迅速占据了理财产品的主流位置,以二维码支付为代表的新型支付方式突破了银联的支付垄断地位而开创了新的领域,这些金融新业态的出现对于深入促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2013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促进互联网金融的有序稳定发展”。<sup>[1]</sup>但随着相关部门下文叫停了支付宝、财付通的互联网金融创新产品,对于互联网金融监管与创新的对弈又成为了外界的关注焦点。政府人造主导下的既有金融秩序与以市场为主导形成的自发创新性金融秩序严重不相适应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爆发,再度引起人们对这种不适应的关注,同时也引发了公众对中国下一步金融体系改革的深入思考。正义作为检验政府制度效果的衡量标准,一直以来也都作为法治社会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而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往往是为了维持现有的金融体制,压制来自市场自发性的创新行为,从而使得金融监管成为阻碍金融改革的制度性内生因素。因此,通过解读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重新审视正义作为首要价值目标对于金融监管的重要意义,这对提升我国金融监管水平,促进金融行业持续可健康发展有着现实性的指导意义。

## 二、对于自发秩序创新的分析

哈耶克的一个重要思想是通过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进行否定,进而强调尊重社会集体行为演进而产生的自发秩序,同时在此基础上反对政府过度干涉与注重个体自由。<sup>[2]</sup>哈耶克(1960)认为,社会活动所具有的秩序性存在于以下的现实之中,即社会中的个体能够坚持性的执行一个计划是因为在其执行此计划的每个节点上,个体都能够预期其他的社会个体会对其计划做出某种帮助。在所谓社会的秩序中社会个体不仅可以有效地运用自身的能力与知识,而且还能够预计到他能从其他社会成员那里可以获得合作。<sup>[3]</sup>自发秩序

收稿日期: 2014-12-26

作者简介: 冯 毅(1978-),男,山东青岛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司金融;唐 航(1985-),男,四川广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司金融;陈雪君(1979-),女,广东潮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与投资。

原理的“建构”是为了解释这种社会经济秩序是怎样自发运行的,这个秩序过程需要很多知识的积累与聚合,但作为个体的人脑并不会集聚这么多的知识,而是以分立的形态存在于不同个体人脑之中。在经济行为过程中单个个体具有的分立知识以及有限理性特性不可能通过运用知识和处理各种信息而形成的这种秩序。真正形成这种秩序的是大量没有意识到最终目标和意义的单个主体的无意识群体行为。哈耶克(1975)提出,在社会领域真正发挥作用的,恰恰是那些通过漫长的时间过程中演化而来的“自发秩序”,它是众人的合力行为结果,但并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群体自发性、自我演化的结果。这样社会科学才有其存在的意义。<sup>[4]</sup>

从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经济秩序”观点来分析,三十多年的中国经济改革过程正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自发社会经济秩序的演进与扩展历史,也是通过中央指令而形成的计划性“人造秩序”被社会实践所否定的历史,<sup>[5]</sup>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走的就是一条互动演化的道路,市场先进行自发秩序创新,然后得到国家许可,再经过不断的演化与扩展,政府与市场通过不断互动协调达到一个产业的自发秩序的生成。对于互联网金融来说,不管是余额宝还是理财通都是市场创新行为的结果,这个创新过程就是企业家为了追求利润而进行的开发新产品、探索新市场的不断试错的历程。企业家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通过自己的创新行为在竞争中获得市场的认同从而创新收益,获得了被其他竞争对手所忽视的利润机会,这样的机制会促使更多的企业家去从事创新工作,进而这些创新行为促进了产业的发展,市场得到了扩大和深化,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就是这个机制的作用使然,余额宝、财付通、微信支付等等都是企业家通过创新行为并且得到了市场检验的新型金融产品。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个过程也是基于自由的单个主体行为,而不是计划的过程。从哈耶克哲学的自发秩序原理来看余额宝这类的产品就是一个自发秩序的金融创新过程。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自发秩序理论中自发性的自由并不是不受普遍的社会规则的制约,而是把这种自由诠释为在规则的保障下的一种个体的存在形式,自由的范畴是个体的行为要在普遍性的规则范围之内。哈耶克强调,当普通的个体不再屈从于他人尤其是政府的专制意志和命令而只接受于法律的约束时,个体才会有真正的自由。<sup>[6]45-48</sup>自发秩序原理为政府的有限性提供了系统的正当性依据,也就是说政府就不能依靠自身的行政性权力来剥夺这些自由,也不能通过人为设计的计划经济秩序去替代市场自发性的秩序演进。政府行动的范围和方式就应受到严格的法律限制,政府的权力也应该加以分立并相互制衡。

### 三、自发秩序创新与金融监管的演化博弈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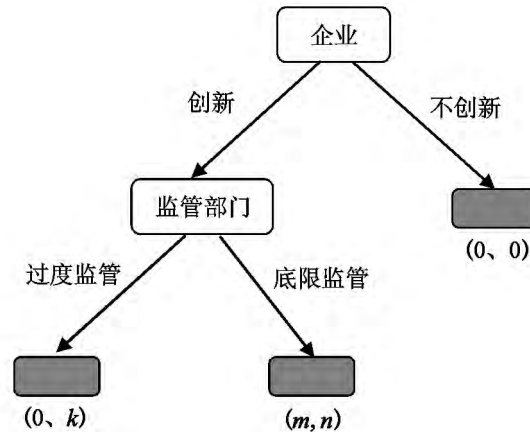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自由既优先于秩序的基础,又依托于秩序的保障,而任何秩序的实施都要有利于保障自由的准则。这就存在着自由与秩序的博弈问题,具体到互联网金融创新领域就是创新与监管的博弈关系,在什么样的监管条件下自发秩序的金融创新可以实现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自发秩序创新要经历动态的演化博弈,其结果取决于金融创新企业与监管部门两者之间的长期博弈,整个金融市场的创新发展就是市场创新群体和行政监管力量之间的博弈均衡。Finnerty(1988)提出的“金融创新矩阵”理论认为监管、环境风险和低成本是产生创新的三大主要需求因素。<sup>[7]</sup>从市场的角度来理解这三个要素之间关系的实质就是两个部类的博弈,也就是监督方和市场创新者的博弈。通常对于监管方来说其首要目标是保证市场的稳定,所以监管方对于市场的创新行为一般都会首先考量其可能对现有的市场体系以及市场秩序的影响程度,如果对于市场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则会采取谨慎保守的监管态度,因此从其监管的首要目标出发,监管方通常对创新行为采取的是压制行为,或者说的不鼓励的态度。对于那些市场创新者来说其依据市场的需求,采取创新行为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获得创新收益,这种行为同时也优化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可以看出,创新企业的以创新收益为目标的自发性行为与监管方的目标取向具有天然性的矛盾,于是两者在市场中产生了长期博弈的局面。以下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一个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来探讨金融自发秩序创新的内在机理。

在第一阶段,企业选择创新或不创新,当选择不创新时,博弈结束,企业与监管方的收益都为0;这样企业会选择创新,博弈进入下一阶段,在这个阶段,监管方的政策选择有过度监管或底限监管两种策略,这里的过度监管是指监管部门会过度运用行政或法律手段来抑制金融创新行为,保护现有金融市场的得利者,从而降低了金融市场效率。底限监管是指监管方以市场的裁判员为监管底限原则,通过行政或法律手段来促进公平竞争,提高金融市场效率。当监管方实行过度监管时,假设两方收益分别为 $(0, k)$ ,当监管方实行底限监管

时,假设两方收益分别为 $(m, n)$ 。

下一步设定市场中的竞争者(下标以 $E$ 来代表)中,采用自发创新行为的比例为 $x$ ,那么采取惯常经营策略的比例为 $(1-x)$ ,同时设定监督方(下标以 $G$ 来代表)中(通常一个经济行为有多个监督方来监管,而不同的监督方所采取的监管策略是有差异的),实行过度监管的监管方比例为 $y$ ,实施底限监管策略的监管方比例为 $(1-y)$ 。由上述的设定条件可以推算出采用自发创新行为的企业以及未采取此策略的企业其期望收益 $P_{E1}$ 、 $P_{E2}$ 及群体平均收益 $\overline{P_E}$ 分别为:

$$P_{E1} = m(1-y) \quad P_{E2} = 0 \quad \overline{P_E} = mx(1-y)$$



下一步,我们可以计算出博弈方企业的动态方程为: $\frac{dx}{dt} = mx(1-x)(1-y)$

这一动态方程意味着:当 $y = 1$ 时 $\frac{dx}{dt}$ 恒等于0,此时任意 $x$ 均在平衡状态,当 $y \neq 1$ 时,均衡状态取决于 $m$ ,存在以下三种情况:当 $m = 0$ 时 $\frac{dx}{dt}$ 恒等于0,此时任意 $x$ 都处于平衡状态,当 $m > 0$ 时, $x = 1$ 位于均衡状态,见下图1所示;当 $m < 0$ 时, $x = 0$ 位于均衡状态,见下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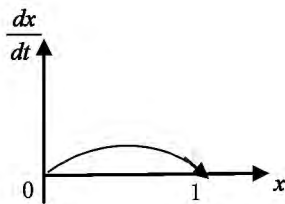


图1  $m > 0$  时的动态均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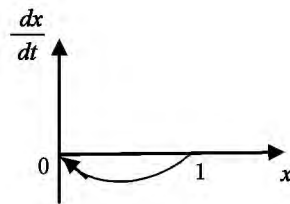


图2:  $m < 0$  时的动态均衡

依据上述方法也可以推算出监督方中,采用过度监管策略的博弈群体及底限监管策略的博弈群体各自的期望收益 $P_{G1}$ 、 $P_{G2}$ 及群体平均收益 $\overline{P_G}$ 分别为:

$$P_{G1} = kx \quad P_{G2} = nx \quad \overline{P_G} = kxy + nx(1-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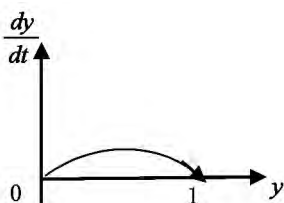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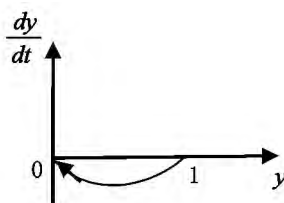
进一步,我们计算出博弈方监管部门的动态方程为: $\frac{dy}{dt} = x(k-n)y(1-y)$

这一方程意味着:当 $x = 0$ 时 $\frac{dy}{dt}$ 恒等于0,任何 $y$ 都处于均衡状态,当 $x \neq 0$ 时,是否处于均衡稳态依据于 $k$ 与 $n$ 的比较,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当 $k = n$ 时 $\frac{dy}{dt}$ 的值为0,这时 $y$ 始终是均衡稳态,当 $k > n$ 时, $y = 1$ 处于均衡状态,如图3所示,当 $k < n$ 时, $y = 0$ 处于均衡状态,如图4所示。

为了进一步研究企业进行自发秩序创新中创新与监管的关系,下面将两个动态方程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当 $m < 0$ 时,在第二阶段不管监管方选择过度监管还是底限监管,企业进行自发秩序创新没有收益产生,此时创新主体的金融创新失败。

图3  $k > n$  时的动态平衡图4  $k < n$  时的动态平衡

当  $m > 0$  时,金融自发秩序创新的成果决定于监管方采取不同监管策略的收益比较,即  $k$  与  $n$  的比较。

第二种情况,当  $k < n$  时,监管方对自发秩序创新的监管持宽松包容态度,经过市场的竞争演化过程其动态均衡结果是:  $x^* = 1$ ,  $y^* = 0$ ,此时自发秩序创新最终取得成功。

第三种情况,当  $k > n$  时,监管方出于保证市场稳定运行的首要安全目标,开始对市场创新行为实施过度的谨慎监管,经过市场的竞争演化过程其动态均衡结果是  $x^* = 1$ ,  $y^* = 1$ ,这就是说尽管企业进行自发创新行为,但由于监管政策对于严厉与谨慎,企业的自发创新行为最终无法得以实现。

由以上的博弈推演可以知道,金融自发创新是连续演化博弈的复杂过程,创新行为是否可以持续进行,取决于金融企业与监管方两者之间的动态博弈,只有当企业具有创新动力,即  $m > 0$ ,且监管部门进行底限监管时,即  $k < n$ ,自发秩序创新才能得以实现。

从互联网金融的自发秩序创新的实际情况来分析,仅半年多时间余额宝的资金规模达到五千亿元,客户达到五千多万;理财通的业务量也迅速达到数百亿,大量银行资金被这些创新产品所分流,这些新兴市场的快速拓展表明了市场对金融创新的认同,同时也是企业进行自发秩序创新的源动力,企业家会在市场认同的条件下具有无限可能的创新动力。再从监管方的角度分析,央行紧急暂停二维码支付和虚拟信用卡、从严监管第三方支付,这让如火如荼的互联网金融创新收到了极大的打压,市场呈现出了悲观的情绪。所以由上述的模型分析可以看出目前互联网金融领域的自发秩序创新动力是源发自主性的,而目前监管方则有过度压制企业创新的倾向,所以创新的关键点就在于监管部门如何才可以做到底限监管,或者说底限监管的底限到底是什么,这对于自发秩序创新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具有重要的作用。

#### 四、监管的正义性分析

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中强调了政府的有限制性,有限制就是说政府还是要有所作为,是为了护卫和维持自发秩序的稳定,具体说就是要肩负起市场裁判员的职责,而作为市场的裁判员应有其基本原则,这一基本原则就是“正义”,这也正是底限监管的底限之所在。正义作为检验和评价政府制度法规实施效果的标准,历来都作为政府制度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然而,正义作为伦理范畴的高层次规范,其评价体系必须要有特定的、具体的衡量标准和途径。而且,正义的广义内涵往往又无法脱离现有社会条件的约束,这就导致了对于现实中的政府监管行为,很难用平等和公正等抽象和模糊的正义概念来评价。这就需要一种具有可执行性的理论和方法来对政府监管的正义性问题进行剖析。

罗尔斯对于该问题做了详细解释,他认为对于任何社会制度来说正义都是最为基本的价值,也是人类行为活动的首要价值。<sup>[8]3</sup> 当社会制度使各种社会现实利益矛盾之间实现合适的平衡时,这些制度就是具有正义性质的。<sup>[8]5</sup> 对此,罗尔斯提出了正义的两个具体原则:第一个原则大意是指社会群体中的每个人都拥有广泛的最为均等的基本自由权利;第二个原则有差别和机会均等两个子原则,第二原则适合于社会最为弱势人群的最大收益(差别原则);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所有人都有机会获得所有职位和地位(机会均等原则),<sup>[8]61</sup>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为如何在社会基本制度中分配权利和义务提供了具有纲领性以及可操作性的方法。在纷繁的人类政治经济现实中,自由与正义会由于各种原因发生各种矛盾。罗尔斯因此提出了正义论的两个优先规则。第一个优先规则指出个体的自由权应该放在首要位置。<sup>[8]62</sup> 第二个优先规则提出正义的第二原则要优先于效率原则和最大提高利益总量的原则;而公平机会原则要优先于差别原则。<sup>[9]</sup> 罗尔斯所论述的一般制度正义原则适用于政府制度领域,同时这也是金融监管的首要价值目标。

从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来看,政府制度正义性最核心的表现就是要使得每个市场个体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这种正义性体现在金融领域中就是主体平等、机会平等、程序平等、权利平等和义务平等。监管部门要

以正义性的竞争环境的创造与持续的改善为监管目标,只有正义性的竞争的环境存在,分立的微观金融主体才会注重以运用符合市场规律的方式改善自身的自发自生能力,整个金融市场将因此更加富有效率。可以看出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就是哈耶克所提出的“自发社会经济秩序”背后的市场的自发性力量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现实性演进拓展,自发秩序创新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内的形成、演进和扩展需要自由市场和正义性的制度这些基础条件,这是互联网金融自发秩序创新得以成功演进的重要前提条件。

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过程中,自发秩序基础条件的形成、改善一直伴随着激烈的非正义性监管。从监管部门下文停止二维码支付这个事件来看,二维码支付使用范围越来越广,而且很多转账支付都已经不再经过原有的银联支付体系,这是个体创新的市场行为,也是实现自由市场化突破垄断的重要步骤,在保证支付体系安全的前提下要允许二维码支付业务的拓展。监管部门应该从正义的原则出发开放支付市场准入门槛,这样每个合格参与者都具有平等的权利参与竞争,每个市场主体依靠自己的产品及创新能力来接受市场的检验,而不是去保护既有支付主体的利益,压制创新支付手段的发展,这是非正义的监管思路。事实上,第三方支付机构在国外已有成熟的市场及监管经验,许多国家通过“监管前置”的手段来进行监管,也就是在事前制定好业务操作细则之后再对市场进入者全面放开市场,金融监管部门会周期性的对支付机构进行金融风险考核并要求其提供风险防范预案,这样即使是风险爆发也有可操作的善后措施来规避风险。如果相关支付机构压力测试没有合格,那么这些支付机构的相关支付业务将被监管部门叫停。接下来再来分析余额宝,余额宝是市场自由创新的产物,而且是处于不平等的弱势市场权利条件下自发产生的,其次余额宝的低准入门槛让低收入群体有了获得高收益率的途径,这部分群体的收入水平得到了提升,从罗尔斯的正义原则第二个原则来看余额宝提高了社会最少受惠者的收益,并且一元起购的门槛基本也就是零门槛向所有人开放,每个人都拥有了平等的权利来使用余额宝,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金融创新似乎是彰显了正义的特征。

互联网金融领域内自发创新秩序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监管部门对于互联网金融领域中自发创新企业的随意性监管必须得到有效的约束。哈耶克指出“罗马帝国执政官对于个人创业自由的逐渐抑制是罗马帝国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罗马帝国早期逐渐形成的自发性经济秩序也随之衰落最终导致消亡”。<sup>[6]112-113</sup>反观我国金融行业,无论是准入门槛,还是行业监督,政府始终保持着绝对的监管控制,人为刻意制造的人造秩序是当下金融秩序主要模式,金融市场的自发创新行为依然受到人造秩序的压制,私营企业很难进入金融行业,市场主体不具有同一种平等的权利,金融市场的市场牌照也没有以平等的机会向所有市场主体开放,这也就直接违背了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从而也就是非正义的监管制度。回顾我国经济领域和金融领域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可以看到,当政府监管部门对于市场自发创新者的行为采取抑制甚至压制政策时,市场就不会有大规模的创新性产品产生,进而产业的创新与发展也得不到长足的发展。反之政府放开准入门槛,实现正义监管的行业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从监管部门角度看,监管部门偏好于维护现有的金融格局,当监管部门与广大创新主体之间利益出现错位时,运用行政手段或法律手段压制创新利便成为监管部门最直接和有效的手段。金融自发秩序创新面临着在不平等市场权利条件下非正义性的监管制度,这是当前互联网金融领域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我国金融领域改革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

互联网金融领域乃至整个金融领域的自发秩序创新演进与拓展必须要以政府相应的正义性制度作为制度支撑,这就要求在进一步的金融改革中要实现金融领域对各类企业主体的开放,使得每个市场主体都具有平等的权利在金融市场中竞争,更为重要的是推动建立具有正义性的监管体系和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这就需要监管部门以更加开明、包容的态度营造鼓励创新的市场环境,真正扮演好裁判员的正义角色。这是中国金融改革价值的源泉和条件,也是有效的金融市场体系所必需的制度保障。对于下一步的金融改革来说,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意味着监管部门对于国有金融机构的政策性倾斜要逐步放开,国有金融机构要真正成为金融市场上的独立参与者。进一步说,这种放开并不是说要拆分国有金融机构,而是要去除过去对他们的政策性保护及监管,这样才是政府监管部门坚守基本正义价值的根本之所在,也是实现金融行业自发秩序创新的根本保证。

## 五、结语

互联网金融领域的自发创新群体与现有监管部门之间所凸显出来的矛盾表明了金融市场中的创新力量与固有势力的博弈。哈耶克的研究表明:由自由的自发性市场创新机制所创造出来的知识与财富要远远大

于那些按照指令性计划体制经济所能生产出来的数量,<sup>[6]72-74</sup>从上个世纪初开始部分国家所推行的中央管控社会经济试验,以及我国采取的经济改革实践都从现实性角度证明了哈耶克自发社会秩序理论。罗尔斯所提出的正义原则也极大的促进了欧美各国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个正义原则也被各国市场经济的广泛实践所验证。只有每个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都有一种平等的权利,才可以出现有效率的自发秩序创新,金融市场的创新与发展才有可靠的制度保证。因此,用正义这个首要价值目标来分析现有金融监管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在整个金融监管体系的立法、执法、司法过程中充分体现正义这个首要价值目标,这对于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监管水平是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的。这也应该是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底限与根本价值所在,同时这也是未来中国金融改革中监管政策演进趋势的重要取向。

#### 参考文献:

- [1] 李克强. 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 [N]. 光明日报, 2014-3-15 (A02).
- [2] 唐士其. 西方政治思想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388.
- [3] F. A.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M]. London and Chicago, 1960: 159-160.
- [4] F. A. Hayek. The Sensory Order: 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Theoretical Psychology [M]. London: Methuen Co, 1975: 37.
- [5] 韦森. 自发社会秩序理论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选择 [R]. 2000: 2-3.
- [6] 哈耶克著. 冯克利等译. 致命的自负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 [7] Finnerty J. The financial engineering in corporate finance: An overview. [J]. Financial Management, 1988(4): 14-33.
- [8] 约翰·罗尔斯著, 何怀宏等译. 正义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 [9] 王守昌. 西方社会哲学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6: 184.

## An Analysis of the Innovation of Spontaneous Order and the Justice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ayek and Rawls

FENG Yi<sup>1</sup>, TANF Hang<sup>1</sup>, CHEN XueJun<sup>2</sup>

(1. School of Busines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innovative financial products represented by Yu'e Bao le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repressive attitude of financial regulators to this innovative format triggers the thinking of outside world about Chinese financial reform in next step. The government led artificial financial order becomes a major obstacle to the next financial reform.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proved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spontaneous order theory of Hayek, it is also the policy orientation of the deep reform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At the same time, Rawls' theory of justice shows that the regulatory system of justice can protect the basic conditions of the formation for spontaneous order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in this condition, the innovation of spontaneous order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may have a sustainable future.

**Key words:** spontaneous order; innovation; financial regulation; justice

(责任编辑: 张秋虹)